

聆听历史的巨大耳朵

阿列克谢耶维奇，很多人知道她，是因为她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。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中，她是倾听了千万个人哀痛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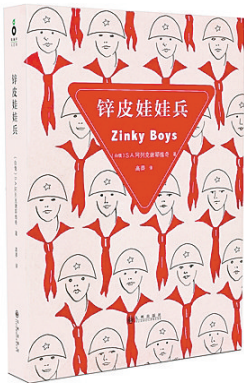
在过去40年里，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一直在聆听。从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苏联女兵到幸存的儿童，从阿富汗战争中的年轻士兵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，从苏联解体的红场游行到白俄罗斯反对总统选举的人们……数千人的声音，被她装进“越来越大”的耳朵，又写到书里。她的书中，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中心人物，也没有主观分析，只能听见“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”。

近日，她到访中国的消息一经发布，读者就像“抢过年的火车票似的”预订她见面会的座位，专访行程被各大媒体预订一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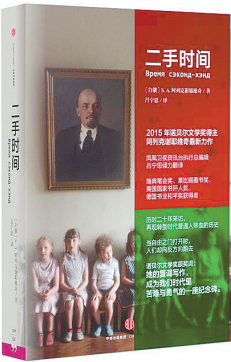
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于1948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。

那是村子里几乎只有老人、女人和孩子的年代。男人大多战死在他乡，得以回到家中者身心难全，酗酒度日。听家里人尤其听村子里的老人回忆战争，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童年；老人们的歌唱如泣如诉，是她童年的声音。



“如果说一个人是一粒沙子，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历史”，一个个渺小个体讲述的故事，使得大历史在无形中也得以窥见。对于这些时间洪流中的沙砾，阿列克谢耶维奇倍加珍惜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当她开始记录自己耳中听到的话语时，她觉得需要保存下对方的每一个词。甚至，她连每一个停顿也不愿漏掉，文本里时不时打括号标注上



“拆解神话”让她被迫离开了故乡，在德国、法国、瑞典等国度过了长达10多年的侨居生活。

2011年，她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居住，继续“从所有时间的空气、空间和呼声中”收集小人物的故事。两年

A “从普通人的诉说中，听到历史省略的部分”

从那时起，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对老人的讲述产生了兴趣，“5岁时，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个作家。”许多年后，当她面对一位位年长她许多的采访对象按下录音键，熟悉的倾吐节奏暗合了她身体深处的脉动，让她如回童年。

“我喜欢人类的交谈，我喜欢孤单的人声。”几十年后，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自己“以耳朵的形式存在”。

当她开始为第一本书《我是女兵，也是女人》收集材料时，她想要寻找的就是与童年村中女人的战争记忆相似的故事。彼时，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数以千计。不过，那些书通通都是“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，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”。

“我对他们杀了多少人不感兴趣，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女人的感受。”阿列克谢耶维奇说。

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近郊，一幢周围

长满茉莉花的旧楼房为阿列克谢耶维奇重新打开了战争的大门，那儿住着她采访的第一个人——一位在二战中击毙过75个敌军的女狙击手。

在喝茶、聊发型、探讨食谱中度过最初的一段时间后，年迈的妇人突然开始用与先前口中的“官方版本”截然不同的语言讲述内心最深处的回忆。

“割掉胳膊或者大腿，开始根本不见血……只有白净净的肉，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。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，特别是看一白眼鸡肉，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股咸津津的味儿来……”

这些充斥着恐怖和绝望的悲剧，在“强大的军事实力”的喧嚣声中，从无立锥之地。

阿列克谢耶维奇意识到，从普通人的诉说中，她听到了“被压制成铁板一块的”历史所省略或者不屑的部分。

B “他们喜欢神话，我正好要拆解神话”

“沉默”“哭泣”。

她借了500卢布买下一台录音机，那大约是她3个月的工资。她常常和访谈对象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整天，而对于被她称作“支柱”的人，她可能聊上20次，“就像绘制肖像那样，不断地回过头，添上一笔”。

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自己变成了一只“越来越巨大的耳朵”，从大街上到火车里，处处倾听。

第一本书耗时7年，她行走了上万公里，进行500多次采访，磁带录了几千米长。打印出来的录音记录堆积如山，她收录了五分之一的采访，从每份上百页的记录中提炼出10页内容。

有时候，她听到的内容“真实得可怕”，让她简直想忘记它们，回到无知的状态。

“在1986年4月26日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，造成大量伤亡。”在这一句苍白的新闻背后，消防队员怀着身孕的妻子赶往莫斯科的医院，不顾一切地想要扑向受伤丈夫的怀抱。医生和护士拦下她的亲

吻和拥抱，他们说，他“已经不是人了，他是一个核子反应堆”。

这位遗孀的口述被放在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的开篇，被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为“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”。

在阿富汗，她亲眼看到苏联的“冰雹”将无辜的村庄夷为平地，被炸没了双臂的小男孩用牙齿接过她送的玩具熊。在这部《锌皮娃娃兵》里，她记录了苏联士兵在阿富汗战场上被扭曲了人性。这本在1989年出版的书让她多次被告上法庭。

“我应该捍卫什么呢？”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法庭上反问，“我没有杜撰，没有臆造，我写作和记录现代的、正在发生的故事，记录活生生的声音，活生生的命运。”

那不是她第一次上法庭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她的第一本书被删减后才得以出版，而关于切尔诺贝利的那本书至今都被白俄罗斯归为禁书。“他们喜欢神话，我正好要拆解神话。”在交流活动中，这个矮胖老太太说起自己与当局的对抗，观众席爆发出强有力的掌声。

C “在每一个国家，我更想听一听你们怎么说”

后，第五部作品《二手时间》出版，主要讲述苏联解体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感受。

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是在沿着心灵生活的足迹，书写一部情感的历史。40年来竖起耳朵，“不是为了收集恐怖故事，而是为了反思”。她拼尽全力去探寻一切的成因，战争到底是如何塑造着人性，每触及一寸黑暗就蜕一层皮。

自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了12个国家巡回演讲和售书。当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，明显已经疲惫极了。

偶尔，她也会流露出一丝失落。“我是非常喜欢倾听的，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不得不更多地来说，所以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。”她望着挤爆了活动场

地、在角落席地而坐的中国读者，“在每一个国家，实际上我都更想听一听你们怎么说，你们对现实的理解。”

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喜欢社交。去年冬天，她的出版商们为她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。“请给这位女士一杯绿茶，她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”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人群中淡淡微笑的那一个。

如今，她终于如愿以偿，把居住了几十年的两居室房子换成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，而且依然面对着她喜欢的家乡斯维斯洛奇河，阳光也可以照进来。

“如果一个人懂得爱，就值得去找他（她）。”在这条河流的陪伴下，新的故事正在采访和书写：关于爱和年华老去，这两个话题依然是那“一”个：关于人。

综合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北京日报》等

◎读书札记

是一种温柔沉静，带着老式的好

□肖建荣

琦君多取材于日常琐事，既不抖博学，也不抖机灵，却十分有味，饱含真情

早在二十多年前，我就读过琦君作品。以至于牢牢记住“琦君”这个名字，倒不是因为她的台湾著名作家头衔，而是她的文字曾深深地打动了我。让我知道，有一种家长里短似的文字叙述，情真意切，像春风拂面，让我长了见识。所以，当我看到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最新版的琦君散文选《爱与孤独》，便迫不及待地购得一本。

与我们常见的所谓学者散文、大散文的宏大叙事不同，琦君散文属于典型的小品文风格。而与周作人、梁实秋那些谈吃谈喝谈文化的散文不同，琦君多取材于日常琐事，既不抖博学，也不抖机灵，所谈话题看似婆婆妈妈，细品之后，却十分有味，饱含真情。比如：她写《烟愁》，从童年好奇向二叔要烟写起，写到最后，她说：“来台湾的最初几年举目无亲，烟更成了我唯一的良伴。现在想想，住在低洼潮湿的宿舍里整两年而没有得风湿病，香烟应该有很大的功劳吧。”她写《水是故乡甜》，从旅欧来美一路喝矿泉水写起，得出的体会是：“说实在的，即使是真正天然矿泉水，饮啜起来，在感觉上，在心情上，比起大陆故乡的水，和安居了三十多年第二故乡台湾的水，能一样的清冽甘美吗？”书中还有一些写景写物的篇章，像《桂花雨》、《毛衣》、《春草池塘》，一样以情动人，堪称佳作。就个人而言，我最喜欢的还是写人的篇章，诸如：《外公》、《父亲》、《母亲》、《我的另一半》、《吾师》等。据说在写人的作品中，其母亲占了很大分量，最感人的几篇都是写母亲的，我有同感。但我更喜欢的则是写老公的那篇《我的另一半》，一是这类文章并不多见，二是写得好的更为少见。琦君的这篇好，就好在她把一个丈夫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，逼真至极。她写老公的“慢动作”，从几种车不坐，到只坐“八成新以上的车辆，司机中年以上，看去慈眉善目的”，这一特有的个人行为举止，个性十足，任何人无法抄袭。

生于1917年，逝于2006年的琦君，被誉为“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”。其作品颇丰，从1954年出版第一部作品《琴心》始，先后有30多部作品问世。要想编好一本她的散文选，并不简单。看得出，《爱与孤独》的编者李瑞腾先生下了许多工夫。本书最终决定以“情”字为编选的核心理念，精挑细选了40余篇文章，并冠以“三更梦”“万水千山”“亲情似海”“春风化雨”辑名，使读者阅读起来更加方便。

读《爱与孤独》，听琦君讲她的家人、朋友以及老师，讲她的过往，随意翻到哪一篇哪一页，尽是些平凡的家事。事事真情无限。我们听到——她是怎样在参加一对夫妻结婚三十周年纪念酒会上，想起中国两句老话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“满床儿女不及半床夫”的。她是怎样在邮箱取信时，遇到邻居老太太，然后她们相谈甚欢，以至感叹：“有情人成眷属不难，成了眷属要永是情人，才是夫妻间一生一世都得体味的深意啊！”她是怎样在布置陋室时，检出恩师夏承焘题写的对联“欲修到神仙眷属，须做得柴米夫妻”，挂好对联，然后想起老师和师母这对神仙眷属的故事，又不禁悠然神往……读着读着，我们仿佛在夏夜，听着摇芭蕉扇的祖母讲故事，不时有微风吹来……

